

臺大歷史系講論會

本系自 87 學年度開始實施教師講論會制度，於學期間由本系教師輪流發表專題報告，每學期約舉辦三次，藉以推動本系教學、研究及討論之風氣。97 學年度由張嘉鳳副教授擔任主持人，各場演講摘要節錄如下。

徐日昇、康熙與內廷西洋人

古偉瀛教授主講

徐日昇神父（Fr. Tomas Pereira, S. J.），1645 年出生於葡萄牙貴族家庭，三十歲晉鐸後來華傳教，1708 年在北京去世。他具有音樂訓練的背景，然而卻是以天文學家的身分來華。在華三十多年，供職欽天監，可能是康熙帝最信任的西洋人之一，也是當時最有影響力的葡萄牙籍耶穌會士。他曾在皇帝前面在聽完一曲後，能立刻一音不差地重彈一遍，令康熙十分驚訝。他滿、漢文均通，且精通拉丁文，為皇帝所派遣赴尼布楚與俄羅斯談判的靈魂人物。該次談判結果十分圓滿，康熙很滿意，終於在 1692 年頒布了著名的「容教令」（The Edict of Tolerance），准許信教自由。

本文試圖分析，徐日昇與康熙帝的關係，以及說明「容教令」之頒布乃是自湯若望、南懷仁以來，內廷西洋人多年努力的具體成果，而徐日昇的臨門一腳，是耶穌會入華以來的高峯。可惜不久之後，中梵關係由於禮儀之爭，而使得康熙帝對西洋人的觀感丕變。教會的發展，本來是如

旭日般，徐徐日日升起，也因此戛然而止。

本文除分析康熙與徐之關係外，也從當時的歷史脈絡中分析徐氏所扮演內廷西洋傳教士中的領導者角色，並指出後世史家或許由於現存史料的關係，有可能過度強調法國傳教士所具備的影響力。徐氏在康熙眼中的重要性，可以從下面所錄皇帝親自題贈在繪有西方傳入的時鐘的扇面上的詩句中看出：「晝夜迴圈勝刻漏，綢繆宛轉報時全，陰晴不改衷腸性，萬里遙來二百年。」徐氏的忠誠、信用及勤奮，使康熙皇帝印象深刻。（2008 年 10 月 30 日）



▲古偉瀛教授（攝於臺大文學院會議室）



柏克思想與英格蘭啟蒙運動

楊肅獻教授主講

柏克（Edmund Burke, 1729-1797）是一個十八世紀英國的政治人物。他雖是十八世紀的人，卻與當時的主流思潮「啟蒙運動」一直存在緊張關係。他的著作常出現對「啟蒙精神」的質疑或嘲諷。過去對他的研究，有學者主張他是傾向十九世紀的浪漫運動與功利主義，也有學者認為他的思想屬於中古士林學派的自然法傳統。要之，不論何者，都認為柏克是「反啟蒙」的。對柏克來說，活在十八世紀似乎有一點時間倒錯。那麼，柏克思想是「反啟蒙」的嗎？這一篇論文的目的，是要從晚近有關啟蒙運動研究的新進展，重新檢討柏克思想與啟蒙運動——特別是英格蘭啟蒙思想——之間的關係。本文希望論證，柏克一些看似「反啟蒙」的措辭，實際上可以放在英格蘭啟蒙運動的思想脈絡中理解。



▲楊肅獻教授（攝於臺大文學院會議室）

柏克的論述雖然經常辭藻豐富、言詞剴切，但其論證方式基本上仍是理性的、經驗的、實證的與有系統的。這些特質都清楚地是屬於「啟蒙的」，而非「浪漫的」。且柏克曾強烈批判盧梭的「感性」思想。僅因柏克強調情感因素，即將之歸類為浪漫派，不免過於簡化。

1970年代以來，啟蒙運動研究有三項重要進展：其一、強調啟蒙經驗的多元性，不再視法國思想為啟蒙運動的全部；其二、發掘「情感」或「情思」在啟蒙思想中的重要性；其三，是重新發現以經驗、實用、包容為特色的「英格蘭啟蒙思想」。從這三個角度看，柏克思想並未脫離啟蒙運動的大框架。放在「英格蘭啟蒙運動」的脈絡中，柏克思想的「十八世紀」特徵就更清楚了。哲學認識論上，柏克站在洛克的經驗論立場，重視感官經驗與實用功利；政治思想上，他主張「社會狀態」即是「自然狀態」，人在社會中享受的好處即是其「天賦權利」。這種主張是「天賦人權」說的另一種版本。宗教理念上，柏克雖反對「理神論」與「無神論」，但力主宗教寬容。「宗教寬容」是光榮革命留下的遺產，也是啟蒙思想的重要資產。

整體而言，柏克的思想既不是十九世紀式的，也不是屬於中古的。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十八世紀」人物，但精神上屬於比較溫和、重視經驗的「英格蘭啟蒙運動」。（2008年11月27日）

（全文請參閱《臺大歷史學報》42期，頁107-171。）

實踐與知識：朱熹的早期學術取向析論

吳展良教授主講

宋代理學家繼承儒家，乃至佛、道兩家傳統，首重實踐與體驗；著述方面，理學家不是不著書，就是份量不多，唯獨朱熹例外。朱熹這樣一個看似「重知識」的思想或行為模式，是如何產生的？它與儒學以及理學重「實踐」的傳統之關係究竟如何？

朱熹約 12 至 15、6 歲時，因父師教導與讀書，對聖人境界有所嚮往，對人生義理極感興趣。這大抵還是本於書本與聽聞，以及想像揣摩得來的知識。朱熹在 15、6 歲左右發現，這種知見無法帶他達到聖人的境界。朱熹後來轉向禪學，主要是「看話禪」。朱熹在 24、5 歲時拜見李侗。李侗指出，朱熹雖說了很多高妙的道理言語，但是在日用之間並無著落，而教朱熹讀經以及「理一分殊」的道理。朱熹剛開始雖然半信半疑，而後卻因此逐漸轉向將「修行」與「讀經」密切結合的道路。其「修行」從此不落於自是與空疏，其「讀書」從此亦具有鮮活而踏實的生命。

朱熹年輕時學「聖人」（人生可及的最高境界）與參禪修道，受佛道影響甚深。然朱熹之學，終究不背離儒學大傳統，其內聖功夫，仍與外王及治道相結合。其要旨，首先認為要學聖人，就必須忠實考究學習聖人的一言一行之微，不能只憑一己心證。其次，認為「聖人」於天下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所以學者亦當如此。這兩點，都使朱

熹重視「知識」的研尋，並進而與外王之道密切結合。

朱熹自幼習儒學，其所學既重視隨時的實踐體驗，又指向嚴於出處進退，以性命相見的終極踐履。他因學聖人不得其門而入，而開始參禪。朱熹早年以「看話禪」為宗，其目的正是要超越學問思辨、語言文字，然而朱熹早年禪學卻仍大有談玄說妙之處。朱熹後來受到李侗影響，重新致力於經典與二程學統研習，由是而回歸儒學，表面上看起來是以書本與知識為學，然而其方法卻是一絲不苟地學習聖人與前賢的一言一行，並付諸日用常行的踐履，以使自身與聖賢徹底同道。

綜合論之，朱熹自幼所學一直同時兼有實踐與知識這兩部分，畸輕畸重之間雖頗有變化起伏，兩者卻一直有著密切難分的關係。（2009 年 3 月 26 日）

（臺大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生吳立仁整理）



▲吳展良教授（攝於臺大文學院會議室）



講論會 / 演講摘要

英國佔埃行動與「自由派帝國主義」的出現，1880-1882

王世宗教授主講

本研究探討 1880 至 1882 年間在國際衝突惡化下，英國自由黨政府內部對於處置埃及問題的構想與作法，以及如此的政策對於自由黨與自由主義意識型態發展的衝擊。此研究本質上是英國政治思想史，而非國際關係史的探討，它藉外交政策與帝國擴張問題呈現所謂格蘭斯敦主義（Gladstonianism）的精神與取向。

本文討論的重點包括：（一）英國自由黨首相格蘭斯敦（W. E. Gladstone）與外交部長格蘭凡爾（Lord Granville）對於埃及問題在構想上的共識與歧見；（二）在國際關係（英國、法國、土耳其、埃及四方）複雜化之下，格蘭斯敦政府的近東政策之調整與確定，尤其是英國何以由主張歐洲協調（Concert of Europe）轉而採取單獨行動，介入埃及政治的改變；（三）英國內部（含反對黨、輿論及自由黨各派系）對於格蘭斯敦政府進軍埃及的政策所採反應，以及自由黨於此的分化與重整；（四）英國佔領埃及的軍事行動中，自由黨政府「右傾」政治立場的表現與強化；（五）英國佔領埃及之後，自由黨政府對英國據埃地位的合理化（justification）論辯，以及為此自由黨外交路線的修改；（六）佔領埃及對於自由黨政治生命與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評估。

此研究並不是要對英國佔領埃及一事作全面的描述，而是欲藉埃及問題劇烈的變

化為例證，釐清英國自由黨中激進主義（radicalism，以格蘭斯敦為代表）與現實主義（realism，以格蘭凡爾為代表）的互動關係，並解釋「自由派帝國主義」（liberal imperialism）興起的原由。

1885 年，羅斯柏理（Lord Rosebery）對「自由派帝國主義」一詞的解釋，表示「自由派帝國主義」的形成，意謂自由黨對保守黨外交政策的認同與推展，而其顯著開端無疑是英國對埃及的佔領。自由黨雖得以鞏固其在新帝國主義時代的政治競爭實力，然因漸少古典自由主義的色彩，而使自我認同與外來認可皆日趨薄弱，終至於得不償失，而在二黨對峙的大眾政治舞台上喪失角色定位，這是英國自由黨盛極轉衰的緣由。（2009 年 4 月 30 日）



▲王世宗教授（攝於臺大文學院會議室）